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先生之風

赵为民 孙战龙 张琳 编





先生之風

赵为民 孙战龙 张琳 编

1825.46
zh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生之风 / 赵为民, 孙战龙, 张琳编.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5

ISBN 978-7-108-02944-7

I. 先… II. ①赵…②孙…③张… III. 高等学校—教师—
列传—中国—现代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8517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15.75

字 数 188 千字 图片 39 幅

印 数 0,001 — 4,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序

闵维方 许智宏

凡学必先有师。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

110年来，北京大学大师云集。一代又一代北大学人，以渊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文明的种子；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努力推动中国向前发展，形成了群星璀璨的人文景观。

因为这些大师的存在，北京大学才能够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才得以打动和吸引无数青年学子，成为全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历史是一条绵延的河流。对任何一代人来说，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循本才能开弘。身处当今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批德高为师、学高为范的优秀学者，需要他们提供智慧的源头活水、确立价值的不易规则，从而使人类文明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北京大学曾经孕育了一大批这样的优秀学者，北京大学今天仍

然需要不断地培养这样的优秀学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北京大学设置了全校教师的最高荣誉——蔡元培奖，以褒扬真正兼具学识和人格魅力的大师，激励广大教师以获奖者为榜样，努力探求高深之学问，培养高尚之人格。

本书收录的10位学者，均为首届蔡元培奖获奖者，是当代北京大学优秀教师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之所以能获此殊荣，不是因为一时一事的成就和影响，不是因为符合了某种特定的潮流和风尚。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用一生去追寻自己心中一种崇高的情怀。从少年到白发，从求学到为师，他们一步一步地创造、一点一滴地积累，无论何时不改初衷，不变信念，方才成就了今天世所敬仰的道德文章。

当季羨林在烽烟万里的异乡寒窗苦读时，他日夜思念的是我们的祖国；当他在“文革”的动荡年代受尽屈辱时，他发奋要在艰难的环境下为祖国未来的文化繁荣做一点了不起的贡献；当他终于盼来学术的春天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但他仍然以百倍的精神毅力，完成了许多学者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大量工作成果。

侯仁之也是这样。徐光宪、曲绵域、王夔、韩济生、厉以宁、王阳元、袁行霈、林毅夫，每一位人师的人生都是一段值得我们用心品味、向往的精神历程。

让我们以10位大师为榜样，怀爱国之心，存民族大义，树远大理想，养浩然正气，师生共济，教学相长，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努力承担和实现我们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也为北京大学的发展不断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目 录

序 闵维方 许智宏 1

行者无疆

——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季羨林教授 1

历史地理学的巨擘

——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侯仁之院士 34

儒雅学者 真醇人生

——记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教授 63

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

——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 79

知识报国的现实经济学家

——记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 102

一清如水

——记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徐光宪院士 135

大道至简 平淡为归

——记无机化学家、北京大学药学院

王夔院士 163

此生唯愿济众生

——记北京大学神经生理学家韩济生院士 189

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守望者

——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曲绵域教授 215

与时代同行 走创新之路

——记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王阳元院士 226

行者无疆

——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季羨林教授

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季羨林：《八十述怀》

“满清遗少”的成长：“从灰黄到浓绿”

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他自身。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纤毫的自然，从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

——谢冕



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接受生日祝贺

1911年8月6日，没落的清王朝正在走向它不可复始的终结，而此时，一个新的生命，却执著地降落在了中国这方深厚的土地上。两个月之后，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而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混乱、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的季羨林先生从出生开始，似乎就在见证着历史的悲壮，也似乎预示着他这一生，必将有曲折坎坷、也将有壮阔波澜。

季羨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这是一个没有色彩的地方，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直至灰黄灰黄的天空，把整个村子严严实实地笼罩。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会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黄泥汤里游泳戏水。全村唯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杨树。只有当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时，才让人感觉到这个单调、沉闷的小村庄的一丝生气。

清平县在当时是山东最穷的县，而官庄则是清平县里最穷的

村，他的家却又是全村最穷的家。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了。因此，季羨林的幼年时光并没有在私塾度过，大部分的时间是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母亲到地里摘绿豆荚，他便跟到地里，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捉到一只蚱蜢，他一定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霉，他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这一段虽然短暂却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在季羨林心里留下了永生不能忘怀的印记，他对母亲的尊敬与爱，也持续了他的整个人生。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中，季羨林曾这样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1917年，季羨林告别了故乡、父母和儿时的伙伴，去济南求学，住在叔父家。叔父对季羨林的期望很高，正是叔父的严格教育，使季羨林从小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且坚持终生，为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功打下坚实基础。在季羨林的青少年时代，叔父为他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使他接受到很全面的教育。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季羨林每天从学校下课后，就先去古文学习班读古文，晚饭后，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坚持了八年。此外，叔父还亲自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讲授给季羨林听，选文的内容大多是理学的文章。季羨林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虽然离乡求学给季羨林创造了极好的受教育机会，但另一方面，过早地离开家，寄人篱下，也使得季羨林在很小的时候性格就

偏于内向拘谨、循规蹈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处境，季羨林从小就明白了奋发图强、勤奋学习的道理，也因此形成了这种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性格。

然而，尽管学习负担重、背负的压力大，季羨林内心深处的纯真与热情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小学的时候，叔父不允许季羨林看小说这种“闲书”，但季羨林却对它兴趣很高，平时在家读书时，桌上摆着“四书”，但他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常常是乐在其中、不能自己。冷不防叔父走进来，他就立刻把“闲书”丢进书桌下面的白面缸里，嘴里则念起子曰诗云来。

在学校则用不着什么防备，一放学，他就躲到假山后，拿出“闲书”狼吞虎咽地读起来，常常是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时看到天黑才摸回家。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个个名字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能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他自己常梦想当那样的英雄：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里带着宝剑，射杀坏蛋强盗，然后再一哼，白光和剑便回到自己的鼻子里。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成百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树木都能戳断。他信以为真，也想练成铁砂掌，便在砂袋里猛戳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才停止了练习。

季羨林的初中是在正谊中学度过的。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后，他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据季先生后来的回忆，“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

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称还能倒背。”当时教国文的是王崑玉先生，他是桐城派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了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他对季羨林影响极大，季先生是这样说的：“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后来，季羨林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作为对季羨林的奖励，这使得季羨林学习更加努力了。季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动机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绝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面子”动机，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季羨林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29年，季羨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是季羨林人生中重要的一年。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他们对季羨林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我写了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50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毫耄之

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季羨林高中毕业，来到北平考大学。由于中学期间的骄人成绩，此时的季羨林内心颇有点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每个人几乎都报考七八个大学，但季羨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是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羨林选择了清华。他没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这个选择，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清华出国机会较多，当时的出国风潮一点都不比今天弱。选择系的时候，他则选了西洋系。季羨林的专修方向是德文，但他对老师四年以来的授课非常不满，相反，使他受益最大的，却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羨林先生在自传中回忆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从初中进入正谊中学开始，季先生的生活色彩已经渐渐由灰黄变得淡绿，然而枯燥、乏味、孤独依旧。那么进入大学以后，他的生活已经是真正的一片浓绿了。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四年。清华校园里充满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求实的精神，师生的友谊，同学间的真情，都使他永远难忘。清华园美丽的景色，更令他魂牵梦萦。大学毕业后，季羨林受母校山东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地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23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这番描述，看起来轻松活泼，但仍

然可以想见季羨林当时“如履薄冰”的心情。教了一年书后，恰逢天赐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先生报名应考，轻松被录取。这年深秋，季羨林离开祖国，远赴异邦，开始了生命的另一段征程。

留德 10 年：追逐一个梦

他将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圆融之智，与他在西方文化中汲取的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加上山东大汉的倔强的民族精神，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季羨林的名字，将作为 21 世纪东方文化的一个象征闪烁着光彩。

——刘 焯

1935 年 10 月 31 日，季羨林到了风景秀丽的小城哥廷根，也许他还没有预料到，这里竟然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将在这里度过人生中最宝贵的 10 年。

1936 年的夏学期，他在教务处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激动不已——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课啊！在清华读书时，他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讲授的“佛经翻译文学”，当时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是因为国内无人能开此课，夙愿一直无法实现。现在真是天遂人愿，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在日记里他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讲授这一课程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的专家。他

虽然年轻，但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享有盛誉。后来季羨林发现，选梵文课的只有他一个学生。正在他担心这一课程会因选课人数太少而停开的时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满面笑容地同他寒暄了几句，很快正式讲起课来。尽管只有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这是季羨林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初次见面。从此，季羨林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也找到了一位最理想的引路人。在《留德十年》中他曾这样说：“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梵文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极为丰富。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读通的语言。季羨林暗下决心，一定要跳过这座“龙门”。每天早晨，他在房东家吃早餐，一壶茶，两片面包。吃完就步行穿过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读书。午饭在食堂或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继续看书，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回家，女房东欧朴尔太太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吃热饭，就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餐给他留一份，这是他一天里吃上的唯一一顿热汤热菜。季羨林就像苦行僧一样地生活，废寝忘食地苦读。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哥廷根大学是学梵文最理想的地方，她有悠久的历史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梵文学者云集，比较文学史学的创建者本发伊、最伟大的梵文家瓦克尔纳格尔都曾在此任教，而且图书馆梵文藏书富甲天下。季羨林用“梵学天空，群星灿列”来形容这座德国古老的大学。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

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这些都是拿到博士学位所必须通过的。第六学期伊始，季羨林就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羨林直率地告诉教授，论文题目绝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问道：“那么，你的兴趣何在？”季羨林回答：“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东部、西部、西北部等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目的缘由。从此，季羨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并且立誓：绝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羨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和吐火罗文，把手教给了季羨林。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教授，毫无私心，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季羨林，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季羨林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

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吐火罗文，5至10世纪通行于塔里木盆地，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掘出吐火罗文古籍残卷，运回柏林，西克和柏林的西克灵教授穷30年之力，终于读通，使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但季羨林“不以为苦”，以惊人的毅力“跳过龙门”，成为东方第一个读懂吐火罗文的学者。

其实当时西克教授提出要给季羨林讲吐火罗文，季羨林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还没有想到学吐火罗文。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习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绝不能再扩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四个“优”，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在当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让人把季羨林的博士论文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语尾——matha的一段附录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的印度，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语尾，这种巧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克劳泽教授对季羨